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對同一篇文章，生活在不同地方、不同境遇的讀者，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感受。陳平原〈近百年中國精英文化的失落〉（總第17期）一文，觸及到中國當前社會鉅變中知識分子出路的敏感問題，北京和湖南的讀者讀後「悲從中來」，而深圳讀者則視「下海」為「生命的體驗」，在美國的學人更倡導「空智運動」……而《二十一世紀》就是要在各地讀者間，搭起心靈溝通的橋樑。

——編者

## 新處境有可能激發新思想

17期確實「佳作甚多」。平原的文章因為和我們的感受很貼近，所以最先拜讀，文章分析得很清楚，態度也很坦然，雖然讀後不免還是有一點悲從中來。我們最好的期望是：這種權力與大眾之間的尷尬處境反能激發出一些很新穎也很深刻的思想，我看是有這種可能的。

讀者 北京

93.7

堅決地下海，  
積極地「無為」

讀了貴刊陳平原先生一

文，驚嘆陳文精彩之餘，不禁感慨，有幾句話想說。

該文最令人震驚的一個細節：當年魯迅在大學任教月薪三百大洋，而普通圖書館員毛澤東只有八塊錢，卻認為待遇不差。看來現在寫現代文學史應該從這裏開始。陳文還提到「在一個正常發展的社會中，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各有位置」，我把這讀成是指西方。僅就經濟上講，西方精英目前同商業社會基本上打個平手。但從文化上講，就其對整個社會人口心理結構的影響力而言，「精英文化」早就輸掉了。不僅其涉及面僅佔整個大學人口的極少部分，而且目前的「後現代文化」具有消化、同化任何嚴肅話語的魔力。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接受這個局面。可是，面對曼哈頓的女人嘖里呱啦的局面，這不簡直是空說空話?! 我要說的就是這個「空」。

我不喜歡「精英」，也不喜歡「知識分子」，也不喜歡「士」，他們不能活就讓他們死去吧，活下來的我暫且稱作「智士」。智士怎麼活？可以學習一個古老的傳統「無為」，積極地用。可以採取「讓愚策略」、「空智運動」，提倡「空的風尚」。具體地說，就是要下海，堅決地下，徹底地下，全

方位下。讓大學留給行政官僚、技術官僚，讓中學留給出租車司機，讓小學留給人民群眾。智士不搞政治，下海謀生，心靈空空，熱愛生活，懷抱希望，甚或還可著書立說，說空話寫空書，為真正的文化建設作準備。這是一場賭博，賭本是我們幾千年重智重士的文化沉澱。要是這樣，今後就別再說「精英文化」啦，「知識分子待遇」啦之類的廢話。

下海的另一個途徑是漂洋過海。

或許有人會說我是留在洋外說風涼話。對，我就是喜歡說風涼話，解熱。雖然，權作「讀者來信」。

錢俊 美國柏克萊

93.8

## 編輯賣書如拍賣家產

出版社一位頗有成績的中年編輯早幾天打電話給我，告我他執意南下，正在清理陳年書櫃，知我愛書，囑我去找一些需要的，餘下的作廢品處理了。我急忙過去，卻未見他有舒展的形色，相對無言。我只是默默地找書，看得出來，告別文化、下海淘金，的確是一次很艱難、痛苦的抉擇，我佩服他還是在默默中邁開了腳步。我沒有去追問他，只是背上書落荒般走了。回頭望他，有如拍賣了家產般的沮喪。這幾天，眼前不時浮現他的那副沮喪的臉，心裏琢磨「錢能安頓靈魂嗎？」

讀者 長沙

93.9

## 一代文運氣數已盡

在目前為官治學兩亦難的情況下，可把「下海」視為生命體驗。「下海」之舉，不是一代文運終結的原因，而是一代文運氣數已盡的結果。我認為，利用這種狹小的「自由選擇」空間，「下海」走一遭，至少有兩方面好處可言：

一是豐富人文知識分子的人生閱歷，促使大家去真正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如中國大陸沿海沿邊的地下經濟及其社會基層黑社會組織日益龐大，警匪一家的現象也很嚴重，意大利模式——政府和黑社會組織共同治理社會的苗頭已清晰可見，但探討現代化理論的學者們卻幾乎都沒將這一基本特徵考慮進去。

二是培養自己的獨立人格。關於財產所有權和人格尊嚴的關係，歐美知識分子比我們的認識要深刻得多。1949年以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缺乏獨立人格的根源在於他們經濟上必須依附於政府。談甚麼獨立人格？況且，所謂「養士」這說法本身就大有問題，它說明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甚至知識分子本身，都沒把人文知識分子的勞動當作一種創造價值的勞動，否則又怎會有「養」這一說？

生活比個性強大。不管大家在內心是如何激烈地抗拒這場「思想改造」，最終都還要接受這一現實：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對大多數人文知識分子來說，學術暫時難以成為一種職業。時勢所至，大家不妨

放鬆心情，將學術研究作為寄情所在，把「下海」視為一種生命體驗，在社會變動中尋找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

讀者 深圳  
93.7

## 應注意重建中國道德價值的討論

何懷宏〈現代社會與道德原則的普遍化〉一文（總17期）所談的道德原則的普遍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近幾年有關於新儒學的討論和重建中國的道德價值討論中一般學者都不太注意，而何懷宏獨具慧眼地指出了儒家倫理的自我主義傾向。的確，這種特殊主義的道德倫理不能轉化為具有普遍價值的社會倫理，它就永遠只能是少數君子自我完善的標尺，而與社會一般公眾無涉。而且，從傳統中國的理學和當代中國共產主義道德的命運中可以看到，這種特殊主義的、個人向善性的道德規範一旦以某種行政手段或意識形態工具強行普及於今社會，勢必造成普遍的道德虛偽或道德殺人（扼殺人性）。

季林 上海  
93.7

## 只講經濟效益，就有可能向宗法化倒退

何清漣〈當代中國農村宗法組織的復興〉（總第16期）有着普遍而重大的現實意義。堪稱中國鄉鎮企業第一楷模的天津大邱莊，其首腦禹作敏私設公堂、毆死人命事件，自四月

披露以來，其宗法統治黑幕才使世人略窺一角，已令人驚駭不已。此事不啻對中國單一發展經濟模式是一聲棒喝。不僅農村，而且在工礦企業、文化事業單位，由於只講經濟效益而不管途徑方式，單位承包人及其管理均有向宗法化倒退趨勢，甚至如大邱莊那樣：越富裕，人身依附越深，人際關係越原始野蠻，大大小小的禹作敏早已是塢堡土皇帝了。這裏須對何文一個觀點作出糾正：何文只看到國家政府對宗法組織鬥爭一面，然而，如果不限於狹義的宗族組織而取宗法文化涵義，則後者事實上正是包括國家政府在內的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的重要基礎，這是任何一個生活其中的人都有切膚之痛感受的基本事實。其道理原很簡單：中國至今是一個農業文化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改變這一點，當然有待商品經濟的摧廓抽薪，然而，依賴或不觸動改變現有的宗法傳統深厚的社會政治文化結構，商品經濟建設又易畸變為野蠻宗法文化統治下的怪胎。打破這一悖論循環，也許有待一種新的系統整體改革的觀念模式才可能。

尤西林 西安  
93.6

## 我們的錯誤和道歉……

第18期頁112圖版權說明應為：  
©1945 M.C. Escher Foundation — P.O. Box 101-3740 AC Baarn-Holland. All rights reserved. 謹此更正，並向版權持有者致歉。

《二十一世紀》編輯室